

杨红樱：终于可以为自己写一本书了



杨红樱 受访者提供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熊安娜

近日,著名作家杨红樱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,从她最新的转型之作《成都往事》谈起,追述自己的文学之路,并就新媒体环境下的阅读与写作关系发表自己的见解。12月20日,由羊城晚报主办的杨红樱签售会将在广州图书馆举行,届时她还会给读者带来一场关于阅读与写作的文学讲座。

“马小跳”是怎么跳到我的笔端的?

羊城晚报:您是怎么走上儿童文学创作道路的?

杨红樱:1981年,我18岁,成了一名小学语文老师,教小学一年级。那一年,正是学校开始使用教育改革后的新教材,就是当下人们常称道的那套语文教科书,学生们最喜欢的课文是一些科学童话,比如《小蝌蚪找妈妈》《小马过河》《乌鸦喝水》。那时候,课外读物稀缺,语文书上的课文远远不能满足孩子们的阅读需求,我尝试写一些类似《小蝌蚪找妈妈》这样有机地将知识性、趣味性和故事性融为一体的科学童话读给班上的孩子听,孩子们都说写得和书上的故事一样好,问我为什么不把这些故事印在书上?在孩子们的鼓励下,我投稿给上海的《少年故事报》,很快便发表了科学童话《穿救生衣的种子》,这是我的处女作,这一年,我19岁。

我当了6年小学老师,只教一个班的学生,把他们从一年级教到六年级,正是一个孩子完整的童年期,这对于我后来的儿童观、教育观和创作观的形成,对于我对不同年段的儿童心理和阅读需求的把握,都是至关重要的。

羊城晚报:您的代表作,让一代青少年持续追读的“淘气包马小跳”系列和“笑猫日记”系列是怎么创作出来的?

杨红樱:在当老师的那几年,我写了大量的科学童话,还写了三部长篇科

学童话,有写森林的《神犬探长》,写海洋的《寻找美人鱼》,写沙漠的《再见野骆驼》。到2000年,我的成名作《女生日记》出版后,我成为专业作家,也积累了近20年的创作经验。这时候,我有了强烈的创作欲望,想写一个真正的孩子,通过这个孩子呈现一个完整的童年,书写一个并不完美但有情有义有担当的孩子的心灵成长史,“马小跳”跳到了我的笔端。“马小跳”寄托了我对孩子味儿的童年的希望,也寄托了我对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理想。

让我欣喜的是,孩子们在阅读马小跳的过程中,爱上了马小跳的表妹杜真子的一只猫,这是一只会笑的猫,他们希望我把笑猫写成一个很长的系列,《笑猫日记》在孩子们的期盼中诞生了,在我的笔下,笑猫是一只只有思想有智慧有中华传统美德的中国猫。《笑猫日记》是在现实的背景中展开的幻想故事,通过笑猫的眼睛,把中国儿童的生存现状和心理现实都写进它的日记里,引起了儿童读者强烈的情感共鸣。

为儿童和为成人创作,是两副笔墨

羊城晚报:您最近出版了新作《成都往事》,题材从儿童开始转向成人,这一转型背后有怎样的考虑?

杨红樱:在我60岁这一年,完成了“淘气包马小跳”系列(30本)和“笑猫日记”系列(30本)的创作,马小跳和笑猫经受了时间和市场的双重考验。为

孩子写作40余年,我觉得终于可以为自己写一本书了。我很快进入状态,从动笔写《成都往事》到完成,时间不过两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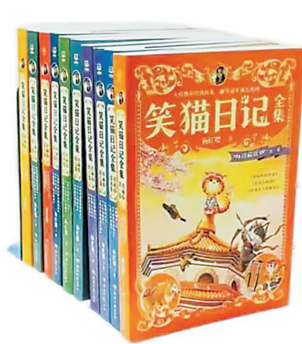
羊城晚报:您在创作《成都往事》这类面向成人的文学作品时,是否会融入儿童文学的写作方法,比如儿童心态的揣摩、富有童趣的语言表达?

杨红樱:不会。为儿童创作和为成人创作,完全是两副笔墨,因为读者对象不同。儿童文学是浅语的艺术,儿童是心智还未成熟的未成年人,为他们写作时,他们在我心中的位置是至高无上,不能随心所欲,细节描写要有所节制,画龙点睛,不能设置阅读障碍,要用生动的形象和引人入胜的情节,引导儿童爱上阅读。这是一种高难度的艺术表达,儿童不世故不圆滑,要得到他们真心认同,是非常难的。

《成都往事》的读者应该是心智成熟的成年人,我在创作时完全可以随心近欲,可以为自己的艺术追求来进行艺术表达,比如我痴迷的细节描写,在这本书中得以酣畅淋漓地发挥。

羊城晚报:《成都往事》中的童年“小哥”形象——无论是他机智仁义的性格,还是喂羊照料梁小猫、和蒋义“捡废铁”、参加“双抢”“军训”等情节,都写得格外精彩。儿童叙事与儿童形象的塑造,是否依然是您最自觉也最得心应手的创作领域?

杨红樱:不少读者也有同感,认为梁小猫和哥哥、蒋义之间的童年友情、少男少女的情窦初开都写得非常出彩,特别是心理描写和对话描写。这部分也整理



【预售】杨红樱《成都往事》《笑猫日记》(全10卷)签名版(包邮)

扫二维码,可购买杨红樱亲笔签名书《成都往事》《笑猫日记》(预售)



在书写日常中以小见大

羊城晚报:《成都往事》里的女主人公小满有三次情感经历,这是不是典型的成都爱情?

杨红樱:小满是典型的成都女性,她身上也有成都人“拿得起、放得下、想得开”的性格脾气。成都女性的地位高,价值观不受世俗的影响。小满人见人爱,有众多的追求者,但她在恋爱中,乐于付出不求回报,内心对独立和自由的那份坚守,让她不仅美丽而且高贵。小满在恋爱的过程中,在乎的是自己的感受,哪怕她的初恋和第二次恋爱都无疾而终,小满都洒脱得很:爱就爱了,散就散了,不纠结不抱怨不自我折磨。她的前两任艺术家男友都对

恋恋不忘,但小满最终选择的终生伴侣全心全意地爱她,一无所有的典型的成都男人“耙耳朵”。这就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爱情,也是典型的成都爱情。

羊城晚报:在写作中,您是否有意追求“于细微处见时代”的创作效果?

杨红樱:我不擅长宏大叙事,喜欢在书写日常中以小见大,在人物刻画和细节描写上下功夫,留下时代的印记。

羊城晚报:为什么会选择用方言来创作这部作品?

杨红樱:只有用原汁原味的成都话来写《成都往事》才有成都的味道,字里行间能给人扑面而来的成都气息。成都话极具文学性,简单的几个字便能生动形象顺带浓烈的感情色彩,比如一件事情的结果不尽如人意又有深深的遗憾,就两个字“哦豁”;再比如美好得无论用多少语言来赞美都不过分,也就两个字“巴适”,或者另外两个字“安逸”。女的说成都话特别好好听有韵味,《成都往事》中的小满和梁姆妈都说一口地地道道的成都话,这对于她们的美和性感,都是加分的。



宋明辉 美国韦尔斯利学院讲席教授

折叠的空间

在那特殊的几年里,周游世界变得不可能了。

我们好在可以出门散步,本以为韦尔斯利就是波士顿郊区一角,散步路线单调乏味。但随着我们计划的散步路线越来越丰富,我突然发现,空间像是被折叠过,即便是丁点大的地方,也可以变成丰富多样的空间。夏日午后,走过像毕沙罗画风的绿色小路,会遇到一座小山,和茂盛的丛林。或与大路保持100米的距离,一直走进遮天蔽日的深林里。

过去有朋友来,都是约在咖啡馆或餐厅,现在可以邀请朋友来参加散步。我们一慢一慢走,探索这折叠起来的空间。悠长的夏日里,校园也展开了新的维度。黄昏时分,湖边的灌木丛中,看到黄色的光一跳一闪,原来是萤火虫,像是在跳舞,光是有频率的。与朋友在林间路上边走边聊,这似乎比吃饭更活跃脑筋,甚至可以探讨哲学上的“林间路”。更走远一点,去康科德、莱克星顿,不是看那些伟大人物的故居,而是看许多普通人们居住的房子。

这样的两年,我们没有出行,但走遍了韦尔斯利和附近的小镇。我喜欢折叠的空间,这让我一直都记得,从一点到另一点,不是只有一条路。折叠的空间让世界变得更丰富了。



曹林 华中科技大学新传学院院长教授

鸡排的情绪价值

鸡排哥挺有意思,但无论如何,火爆到如此程度,热搜里充斥着“鸡排哥”字眼,真让人有不适感了——人们的情感和精神需求,真荒芜到了需要靠一个鸡排哥和他的金句去提供了?鸡排哥很朴实,但种种对他的炒作营销很夸张,这些夸张营销,已经远远溢出了一个煎炸鸡排普通人的生活,超过了这种行为本身的限度。

我看到的不是什么“小人物”“烟火气”“活人感”,而是某种价值空心和精神空虚,一种把硬造出来的凡人流量吃干榨尽的贪婪,一种用流量去造神并操纵议题的自负,一种在鸡毛蒜皮中造神捧神、营造虚幻满足的空洞。

一个路边摊的鸡排,再好吃、再好玩、再有趣,它毕竟就是一个鸡排,能够上升到什么高度呢?把一个普通的鸡排,一个摊主普通的几句话,无限地上价值、上流量,上到鸡排远远承受不了的高度,制造“泼天的流量”,这只能映照出流量的肤浅。

说到“情绪价值”,情绪价值这个词,本身包含着一种苛求他者、消费他者的自我中心主义视角,以上位者角度俯视下位者,你得给我提供情绪价值,逗我开心,让我快乐。人家鸡排才卖几块钱,付出了煎炸鸡排吸油烟的体力劳动,还要表演脱口秀,提供情感劳动。说得重一些,这是一种“情感敲诈”——人家卖鸡排卖得快乐,然后顺便给你送几句好听的话,那是他乐意。都围到他的摊子那里排队买鸡排,排队等他提供情绪价值,就是“情绪价值勒索”了。



尤今 新加坡作家

海市蜃楼

这个故事,是北非阿尔及利亚的朋友法里德告诉我的。

“阿卜杜拉是我中学的室友,家住撒哈拉沙漠边缘的小镇。毕业后,他随叔叔坐四轮驱动车穿越沙漠,到城市去工作。起初替人打工,后来当了老板。多年下来,赚得钵满盆溢。然而,他锱铢必较,把每一分钱都攒成两半来花。辛辛苦苦地拼搏了大半辈子,身心俱疲,终于,决定回乡养老。可他却不舍得租用快捷安全却收费高昂的四轮驱动车,只雇了一匹便宜的骆驼。不料半途风沙猛烈刮起,骆驼迷失方向,结果呢,他命丧荒漠。毕生积蓄,无一能享用。”

我另一个朋友阿里,境遇也差不多。年轻时漂洋过海去工作,舍不得吃、舍不得穿、舍不得用。衣服有补丁、鞋子有破洞。晚年归乡时,才舍得换上新衣新鞋。可惜途中遇上风浪,船只倾覆。捞起尸体时,那双湿漉漉的新鞋还兀自闪着亮光哪!”

法里德沉吟片刻,说:“人生是进行式的,我们应该边走边享受。如果果子成熟时舍不得摘来尝鲜,全部存放在箱子内,一心一意等着老来才享受,临老打开箱子一看,果子早已腐烂发臭了。”

他继续强调:“我们不要把原本握在手里的真实,变成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啊!”



杨早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

不同以往的南京

老克是我的朋友,年龄也跟我差相仿佛。《南京城里岁月长》的作者敏而,是老克的学生,我推测她也跟我的学生差不多,是一个80后,甚至是90后。

这一代南京人的特点,便是没经历过战乱。那些曾在战火中求生甚至躲过举世震惊的南京大屠杀的人,对这座城市的记忆与感受,或许会不一样。

敏而带着千年的六朝忧叹,去摸索南京的每一寸土地——这种书写,与我喜爱的《我们生活在南京》风格迥异,却同样成为认识这座城市的一种向导。

我没能成为南京人,但对南京的情感始终刻在家族基因里。我的天祖、高祖和叔高祖,都在南京贡院考学:1931年,我家从苏州迁南京,1937年离开。几乎是怀着一种热切,我翻开了敏而的这本书。她没有让我失望。三十余篇文章,塑造出一个迥异于旅游指南、外地人传说,也不同于以往叙事中那个被攻陷、被劫掠的南京。

她写出的,是吴敬梓笔下那个连“酒肉菜保皆有六朝烟水气”的南京。



爸妈,笑一笑

悼黄俊东先生

10月1日晨,接沈西城兄自港来电,惊悉黄俊东先生在悉尼逝世。后又得知他是8月10日安详离世的,终年91岁。

俊东先生是香港著名作家,编辑家和藏书家,长期担任金庸创办的《明报月刊》的编辑。1986年2月,我写了小文《施蛰存先生的贺年卡》投稿《明报月刊》,次月即刊出,编辑正是俊东先生。

我在张爱玲研究上第一个较为重要的成果,是发现了张的中篇小说《小文》。当时第一时间通报俊东先生,他马上要我撰一评介文,与《小文》一起在1987年1月《明报月刊》新年号刊出。台北《联合报》副刊同时连载《小文》台湾版,也是他一手安排,从而在海峡两岸造成了一个“张爱玲震撼”。

对我所从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料研究,他不断鼓励我:认真查阅,认真思考、认真写作,持之以恒,必有收获。

我初次见到俊东先生,是在1991年3月的“中国当代文学研讨会”上。3月24日,方宽烈先生宴请,俊东先生和高贞白、陈无言等先生都出席了。现在,高、陈和俊东先生都离开了我们。但他们留下的文字,相信会一直拥有读者。



钟红明 上海《收获》杂志执行主编

“蜜糖之苦”

姚鄂梅的长篇《蜜糖之苦》开篇,讲述了一件源自作家真实经历的轮渡事件:一艘摆渡船,行至江心时,甲板边缘的长途客车滑入江中……小说讲述单亲妈妈郑丽娟错过了这艘船因而幸存,得知死亡赔偿款有80万元时,她决定“假死”,以死亡赔偿金帮助婚姻陷入岌岌可危境地的女儿,而她自己被宣告死亡,失去合法身份,不得不像卡夫卡笔下的地鼠一样,隐匿挣扎求生,她自以为做了问心无愧的好妈妈,但“真相”残酷地一一浮现……

小说原本叫“挚爱进行曲”,我提议作家进行修改,最终变成了“蜜糖之苦”。

姚鄂梅以“单亲妈妈”的象征性家庭结构为切口,实则探寻的是中国式“好的家庭”抑或“好的家庭关系”应有的形状,尤其是原生家庭对孩子成长的影响。

小说的后面,郑丽娟出现在女儿面前,80万元已经被女儿付了房子的首付款,女儿把她反锁在房间里作画,对自身的刻骨反叛和疯狂的内心愤怒,被她倾泻在画布上,她的画作引起关注,女儿“骗”出采访,她在不得不逃离现实的同时,纵情拓展出无限的灵魂空间。

小说里,还有一个情节也令人战栗:当小安回到母亲的故乡时,看到的不是母亲一次次讲述的诗意和温馨,而是破旧的老房子,亲戚之间不加掩饰的算计,于是小安用水泥封闭了老宅,最美的故乡记忆,就像一场最浪漫的虚构。